

政治·外交

## 亚洲世纪：困境与未来

邱永辉 刘玲芳

**摘要：**百年变局中，“亚洲世纪”及其理念下的亚洲发展和共同体建设正面临严峻挑战。基于学术界前期对“亚洲世纪”的理念和发展现状的研究，“亚洲世纪”的发展可分为分裂的亚洲时期、觉醒的亚洲时期、崛起的亚洲时期和腾飞的亚洲时期四个阶段，“亚洲世纪”在不同的阶段面临不同的困境，如地缘政治竞争、大国关系紧张和经济乏力等。基于历史和现实困境，结合中国、印度、亚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等多方学者和政要的不同意见和观点，未来世界主要大国及域外其他国家都将在“亚洲世纪”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印、中美关系和地区局势走向很大程度决定“亚洲世纪”的未来，其确定性来源于亚洲大国间加强政治对话、深化安全合作和推进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努力，“亚洲世纪”的轮廓将在各国持续展开的对话、竞争和冲突中逐渐清晰。

**关键词：**亚洲；亚洲世纪；困境；中印关系；中美关系

**收稿日期：**2021-12-20

**作者简介：**邱永辉（1961-），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南亚政治社会与宗教文化；刘玲芳（1997-），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政治与中印关系。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专项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近年来，“亚洲世纪”的各种讨论前所未有地出现在全球讨论中。<sup>①</sup>全球化发展增强了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亚洲，以期亚洲发展能够给世界提供更优方案和选择，“亚洲世纪”因此成为重要议题。不难看出，对“亚洲世纪”的乐观看法和悲观预测皆有之：在“西方常胜论”者看来，亚洲世纪是不具现实佐证的乌托邦构想，因为西方仍旧掌握着世界的控制权；而“亚洲崛起论”者认为，全球经济政治重心正逐步向亚洲转移，亚洲的崛起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亚洲世纪”也正在从理念走向现实。

---

<sup>①</sup> M. Shamsul Haque, “Rethinking Public Governance in the Asian Century: Grand Discourse Vs. Actual Reality”, in S. Bice et al. (eds.), *Public Policy in the “Asian Century”: Concepts, Cases and Futures*, International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2018, p.41.

---

《南亚东南亚研究》2022年第1期，第1-17页。

本文首先分阶段讨论“亚洲世纪”的困境，然后分国别梳理学界和政界对“亚洲世纪”前景的认识，最后提出作者对“亚洲世纪”的困境的认识和对未来的展望。本文所探讨的“亚洲世纪”，以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为重点，以中印两个人口大国为中心，西亚地区较少涉及。

## 一、“亚洲世纪”的困境

亚洲大国的崛起或复兴必将引起世界秩序变化，这一观念正日益受到世界关注，于是人们越来越多地讨论“亚洲崛起”和“亚洲世纪”的到来。但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暴露的非传统安全对世界秩序的挑战，使人们不得不思考亚洲如何迎接挑战，继续走复兴之路的问题，同时也让人们意识到，自“亚洲世纪”提出之日至今，一直面临着各种障碍。本节聚焦二战结束以来“亚洲世纪”在各个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困境。

### （一）分裂的亚洲（1947—199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主义势力逐渐退出亚洲，各国致力于自身的国家整合和国家建设，“反殖民化”时期形成的“亚洲共识”开始弱化。美苏介入驱使亚洲国家分裂成两极对抗阵营，进一步加剧亚洲割裂状态。国家格局动荡和区域对抗升级，使殖民主义的遗产困境、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冲突成为该时期“亚洲世纪”面临的主要困境。长达十几年之久的“冷战对抗时期”导致“亚洲世纪”的共识严重迟到。<sup>①</sup>

#### 1. 殖民主义的遗产

二战结束后，处理殖民主义的遗产问题成为大部分亚洲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导致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滞后、边界纠纷不断并引发地区冲突或边界冲突，如中印边界冲突、印巴克什米尔冲突等，重创了“亚洲团结”的理想。在东南亚地区，西方殖民国家争夺势力范围的结果，导致既留下了陆上疆界之争和岛屿主权之争，也留下了因领海及大陆架疆界划分问题的争端，“殖民主义的遗产”在二战后长期存在。<sup>②</sup>

对大多数亚洲国家而言，“分而治之”的殖民主义遗产造成民族国家发展弱化，进而加深民族冲突。<sup>③</sup>殖民者利用手段使国家、民族或宗教产生分裂，以分别控制和统治的手段弱化了被殖民者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并阻碍了国家重组之后

---

<sup>①</sup> 邱永辉：《从亚洲世纪到全球治理：文化视角下的中印关系》，《学术前沿》，2019年第10期，第88页。

<sup>②</sup> 郑一省：《东盟国家间领土边界争端的成因及影响》，《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2期，第30页。

<sup>③</sup> 何跃：《种族冲突与国家弱化——兼论弱化国家的行政管理》，《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4页。

建立新的身份共识和国家共识，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重组之后种族纠纷和经济冲突不断，最终走向分裂。“分而治之”的殖民遗产不仅造成国家内部脆弱，而且为外部势力干涉内政提供辗转空间。亚洲部分国家在独立后继承殖民统治的双重政治遗产，“权威和民主”的结合造成亚洲政治的脆弱。一方面承续殖民地时代形成的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政治架构与形式，而另一方面逆民主的精神与原则而行专制之实。<sup>①</sup>从长远看，殖民主义的制度遗产严重阻碍亚洲国家的“去殖民化”进程，西方殖民主义遗存使亚洲陷入长期的困境之中。

## 2. 地缘政治竞争

冷战时期的政治和战略秩序，以美苏两国的权力和影响力为中心。欧亚大陆成为美苏地缘政治争夺的主战场，而亚洲地区则成为美苏地缘政治博弈的前沿阵地。两极格局的地缘政治争夺，导致亚洲的困境，即亚洲各国的政治格局和各国家间的政治格局出现分化和重组，从而进入“分裂的亚洲”时期。

美苏在全球范围内对海权与陆权的争夺，使朝鲜半岛和东南亚成为域外政治力量在地缘战略上积极争取的地区，亚洲地缘政治经历了从碎片化到重组的变动。从地缘政治视角分析，爆发于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完全可以“看成是一场典型的陆权与海权之间的斗争”。<sup>②</sup>朝鲜半岛是东亚地缘政治辖区的边缘地带，是海权国家进入大陆腹地的“闸门”。朝鲜半岛分裂导致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动荡，加剧了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分歧，造成了持续性不确定的地缘战略竞争长期存在。

至20世纪70年代，亚洲的地缘政治面临重大重组。两极格局平衡因新的力量中心出现逐渐被打破，亚洲国家面临的地缘“安全困境”愈加凸显，新的地缘政治冲突爆发，如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和珍宝岛之战，以及1979年的中越边界战争。东南亚成为亚洲的地缘政治重心，中越南海争端因周边国家对南海地缘政治利益的争夺演变为东南亚的“地区性”争端，域外大国和地区国家在柬埔寨的地缘政治竞争引发的激烈对抗和冲突，使地区安全遭受严重破坏，东南亚因此被索尔·科恩称为是战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两大破碎地带之一。在西亚地区，美苏为争夺石油资源和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控制权，引致西南地区持续激烈的权力斗争，使其长期陷入地缘政治动荡和无解的僵局。

## 3. 意识形态冲突

冷战不仅是美苏两大集团间的地缘政治冲突，也是超越地缘政治利益的意识形

---

<sup>①</sup> 许开轶：《东亚威权政治形成的原因与背景分析》，《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71—72页。

<sup>②</sup> Geoffrey Parker and Croom Helm,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85, p.138.

态斗争。<sup>①</sup>随着意识形态冷战在全球扩散，两种不同的力量基于意识形态对抗重塑亚洲文化价值和政治体制。由此造成亚洲世界共同的文化与传统分离，意识形态分歧造成对概念化“亚洲世纪”思想固有的亚洲共同身份的质疑。

20世纪50年代，美苏对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争夺由欧洲转向亚洲。亚洲地区的国家间关系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日趋紧张，并由意识形态冷战升级为军事冲突，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以及印支国家与东盟的冲突本质上是两种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果。基于现实主义的视角分析，“美国原本不需要军事干预越南，越战实际上是一场典型的由冷战意识形态驱动战争”<sup>②</sup>。可见，该时期的地区矛盾和冲突主要围绕意识形态斗争产生，美国为防止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在亚洲地区渗透，联合日本、菲律宾等国家组建军事同盟，由此形成亚洲国家之间的“战略牵制与平衡”。

西方国家将共产党政权领导的中国视为专制独裁国家，而将继承英国民主政体的印度视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典范，由此建构出“专制的中国与民主的印度”的意识形态对立。西方国家对亚洲地区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加剧了中国、越南和朝鲜等共产党政权与亚洲非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因地缘政治竞争升级的地区局势动荡，导致亚洲地区的混乱和分裂。

## （二）觉醒的亚洲（1991—2008年）

“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组变得更有利于推动亚洲重新在全球秩序中占据中心地位”。<sup>③</sup>亚洲正处于经济、政治深刻变革和调整的过渡时期，地区的安全隐患主要来自于由经济困境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确定性。全球化发展使东亚的经济重心不断转移，亚洲发展进入新阶段，但存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经济危机爆发阻碍亚洲经济发展整体进程；二是亚洲部分国家政治革命过程尚未完成。

### 1. 经济危机的爆发

20世纪90年代，亚洲地区遭受的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多方面的发展。中国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被称为亚洲经济“领跑者”的日本受泡沫经济影响，进入“失去的十年”。“东南亚也处在1997年的经济危机中，因外汇储备不足，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都面临货币贬值和债务激增的危机”。<sup>④</sup>经济危机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在印尼诱发了严重的政治和社

---

<sup>①</sup>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The Cold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3.

<sup>②</sup> 王立新：《美国的冷战意识形态：内容与作用》，《史学集刊》，2011年第5期，第15页。

<sup>③</sup> 帕拉格·康纳著，丁喜慧、高嘉旋译：《亚洲世纪：世界即将亚洲化》，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32页。

<sup>④</sup> 同上，第35页。

会危机，使地区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东亚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亚洲国家经济，“造成各国财富损失惨重，经济实力大幅度下降；经济秩序严重混乱和经济运行困难；经济的增长进程被打断，经济陷于停滞”。<sup>①</sup>在亚洲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尽管东亚地区整体局势保持相对稳定，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秩序和经济格局的平衡已经被打破。

进入21世纪，部分亚洲地区经济状况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的加速推动下开始好转。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通过经济改革实现国内经济持续增长，但2008年西方经济危机爆发又对刚复苏的亚洲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经济危机的再现和应对不力，暴露出亚洲国家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脆弱性，各国为转移国内经济问题制造的地区性矛盾和冲突，严重破坏了地区安全。经济危机对国家和区域发展产生持续性影响，一方面经济不断恶化诱导诸多政治社会问题产生，使国家短期无法走出经济停滞的困境；另一方面因经济相互依存产生的国家经济安全威胁严重影响地区安全。

## 2. 未完成的政治革命

后殖民时代结束后，亚洲部分国家尚未实现国内政权的稳定和统一。国外学者据此认为，“亚洲政治风险存在于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未完成的政治革命，以及政治领导人如何应对经济和社会挑战，以确保国内安宁和防止混乱”。<sup>②</sup>以印度为例，不彻底的政治革命是印度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即土地占有两极化、种姓制度、贫困问题等长期存在。国内学者指出，“印度低成本的政治革命和独立之初不彻底的所有制改革造成其“畸形”的国家发展”。<sup>③</sup>旧的政治文化存在使印度的社会制度不是反哺农民，而是资本家和地主阶层，尼赫鲁留下的民主体制和殖民统治留下的议会体制均不能为印度未来提供明确的国家定位。“不彻底的土地革命使种姓制度、封建生产关系残余和资产阶级议会选举政体相结合，强化农村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加剧等级分化和对立”。<sup>④</sup>未完成的政治革命和不健全的政治体制不断激化社会矛盾，影响印度的国家发展和政治现代化进程。

该时期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成为亚洲政治亟需解决的最大难题，许多国家在推行民主政治改革过程中遭遇重大挑战。一是长期存在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之间的不协调性，可能导致政治转型带来国家政治崩溃；二是在殖民遗产和冷战遗产的双重作用下，民主政治体系容易出现不稳定的领导和政权过渡。如印尼、马来西亚和

---

① 郭震远：《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经济的前景》，《和平与发展》，1998年第2期，第1页。

② Michael R. Auslin, *The End of the Asian Century: War, Stagnation, and the Risks to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7.

③ 张文木：《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页。

④ 王静：《从土地改革看印度民主制度的绩效》，《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3期，第83页。

新加坡政治的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问题，执政党如何在努力维持权力和化解民众对更开放的选举制度的要求之间达致平衡。由此来看，政治革命未完成的国家，在政治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内在矛盾无法解决的困局，进一步造成了国家政治自信危机和“畸形”的政治形态。

### （三）崛起的亚洲（2008–2017年）

继美国因华尔街危机、欧洲因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副作用而遭受打击之后，关于21世纪可能属于亚洲的猜测在2010–2012年间逐渐上升。<sup>①</sup>亚洲经济快速增长和亚洲实力不断增强，使学者们开始讨论“亚洲崛起”。此时亚洲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更加凸显，亚洲国家因政治腐败、政治分歧引发的政治危机，以及维持经济活力的障碍，使亚洲国家之间缺乏战略互信，区域合作的共识难以达成。

#### 1. 政治危机

政治腐败和政治安全问题是该时期亚洲国家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亚洲的经济犯罪和权力腐败更加恶化。如日本的“制度化腐败”、马来西亚的“世纪性腐败”、中国的“致命性腐败”<sup>②</sup>等，政治危机已严重侵蚀亚洲国家的政权体制和社会制度。西亚地区因政治腐败引发的政治分裂，导致国家内战和区域冲突愈加恶化。2011年初，“因粮食安全问题和政治腐败问题日益严峻，许多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参加反政府暴动”。<sup>③</sup>而且，“腐败加剧正在使社会崩溃的亚洲的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破坏对善治必不可少的公共机构的诚信，最终可能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定”。<sup>④</sup>

亚洲政治的另一风险在于国家间的政治分歧和潜在的武装冲突。经济快速发展不仅没有带来亚洲国家间的区域融合，反而加剧国家间的政治竞争，甚至持续恶化地区国家关系。多元化政体和社会制度差异使亚洲国家无法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政治互信的缺失增加了问题解决的复杂性，如中印边界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朝韩半岛问题等。因此，除了基本的“亚洲意识”之外，亚洲没有形成有效的区域政治共同体。<sup>⑤</sup>

#### 2. 经济乏力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各国均对自身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走势抱持

---

<sup>①</sup> Jhon West, *Asian Century...on a Knife-edge:A 360 Degree Analysis of Asia's Re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gapore: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2.

<sup>②</sup> Ibid., p.264–267.

<sup>③</sup> 帕拉格·康纳，丁喜慧，高嘉旋译：《亚洲世纪：世界即将亚洲化》，第36页。

<sup>④</sup> Jhon West, *Asian Century...on a Knife-edge:A 360 Degree Analysis of Asia's Re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gapore: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253–265.

<sup>⑤</sup> Michael R. Auslin, *The End of the Asian Century: War, Stagnation, and the Risks to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9.

不乐观态度，中国经济也在2015年进入缓慢增长的“新常态”，亚洲正遭受经济发展停滞所带来的困扰。人口结构转变导致亚洲的人口红利消失，而据一些经济学家的估计，“此前经济快速增长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是由于人口红利”。<sup>①</sup>近年来亚洲人口增长率逐渐降低，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劳动力市场收缩，亚洲面临着严峻的人力资本困境。

亚洲国家间竞争，对区域合作形成挑战。亚洲经济的新活力在于国家间的开放与合作，如此才能解决亚洲欠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困境，以及因经济边缘化国家的“内政安全”而演化成的“全球性”问题。但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威胁论”的声音层出不穷，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担忧日益增长。再加之经济极化问题导致的区域发展失衡，使国家间的贸易不对等和贫困问题加剧，由此激化的国家竞争可能消解国家间合作的积极性。

该阶段亚洲国家的经济结构性改革进入瓶颈期，甚至可能面临改革失败带来的经济崩溃。如日本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改革方案，使整个国际社会不堪重负。<sup>②</sup>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也面临诸多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经济改革面临着在经济奇迹结束后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难题。“无论是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奇迹面临的风险来自于经济改革未能应对经济增长的代价”。<sup>③</sup>

#### （四）腾飞的亚洲（2017-）

帕拉格·康纳认为，由亚洲主导的世界秩序始于2017年。2017年以来，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和国际秩序的脆弱性增强，特朗普胜选及美国政治的重大改变引发全球性的政治危机。该阶段“亚洲世纪”的主要困境来自中美关系由竞合走向对抗，美国的亚洲战略调整，以及在此形势下中印关系因边界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等引起的变化，以及当前新冠疫情带来的世界格局走向，特别是中美、中印等大国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与欧盟、东亚国家的合作等问题。

##### 1. 新时代的中美变局

2017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美国对华的重大战略调整引起中美关系急剧变动。过去推动亚洲发展的一些关键因素，如“美国市场开放、相对温和的安全环境以及稳定的全球经济体系等正在恶化”。<sup>④</sup>特朗普执政

---

<sup>①</sup> Jhon West, *Asian Century...on a Knife-edge:A 360 Degree Analysis of Asia's Re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gapore: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186.

<sup>②</sup> Ibid., p.265.

<sup>③</sup> Michael R. Auslin, *The End of the Asian Century: War, Stagnation, and the Risks to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6.

<sup>④</sup> Jhon West, *Asian Century...on a Knife-edge:A 360 Degree Analysis of Asia's Re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gapore: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326.

与“亚洲世纪”的诸多挑战相碰撞，甚至还将塑造可能的“亚洲世纪”的轮廓。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逐步对华实施战略围堵，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对抗升级。在经济、技术和投资层面对华接触收缩，不断强化中美贸易壁垒，并以实行对等贸易为由全面发动对华贸易战。在地区安全层面强化美日韩同盟的安全防范，加强南海巡航，利用南海问题制造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分歧。同时利用台湾问题造势，试图在香港、新疆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在彭斯演讲和蓬佩奥的国际活动中，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和对华敌对情绪，从制度文化层面升级对中国的批评。在此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趋向常态化，竞争的广度和重点领域的深度都进一步增强”。<sup>①</sup>

中国崛起和美国领导力相对衰退，使美国担心自己正失去在亚洲的立足之地。因而特朗普政府将亚洲的战略定位从“亚太”调整为“印太”，试图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层面实现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地区的联合，以周边国家为基点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在韩部署“萨德”系统激化朝核问题，导致朝鲜半岛局势恶化，东北亚地区安全遭受威胁。在南亚地区，中印关系也因中美竞争和摩擦不断升级，“在洞朗地区爆发了近30年来双方最为严重的边界对峙”。<sup>②</sup>从中印现实来看，“印巴关系与中巴关系的矛盾，经济发展结构差别造成的贸易、投资不平衡，以及两国的制度价值理念差异短期无法解决”。<sup>③</sup>亚洲国家间关系也因中美、中印关系变动受到重大影响。

## 2. 疫情下的新挑战

进入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持续恶化2017年以来的政治危机，世界政治秩序发生深层次的质变。疫情使中美由贸易战迅速升级为经贸、政治、军事等战略上的全面对抗，美国借台湾问题、南海问题、香港问题和新疆问题不断升级中美紧张局势。在中国周边地区，美国利用朝核问题不断干预朝鲜半岛局势走向，导致地区国家关系紧张，严重破坏东北亚地区安全和阻碍“中日韩自贸区”构想的进程；并试图从内政外交层面对中国进行战略阻挠。在最新的战略安排上，美国《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重点提及在“印太盟友”“四边机制”和“美台关系”中的战略布局，更加突出中美在大国战略和地区战略层面的竞争。疫情使中美沟通渠道缺失，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恶化和民间对立倾向泛滥，最终的结果将是完全的贸易脱钩和产业重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2020年阿斯彭安全论坛上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处于

---

<sup>①</sup> 韩召颖、黄钊龙：《从“战略协调”到“战略竞争”：中美关系的演进逻辑》，《国际观察》，2020年第2期，第66页。

<sup>②</sup> 叶海林：《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4期，第107页。

<sup>③</sup> 张蕴岭：《新时代的中印相处之道》，《世界知识》，2020年第12期，第72页。



非常关键的时刻，两国正在进行的抉择，不仅将真正决定中美的关系，也将塑造世界的未来”。<sup>①</sup>

在中美博弈不断激烈的情况下，疫情使中印关系因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面临巨大风险。特朗普访印促使中印、美印关系发生深刻变革，“印度正逐步从军售防卫、‘印太战略’、经贸投资等方面加速向美国靠拢”，<sup>②</sup>今年4月，印方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单方面挑起边境冲突，随后中印边界对峙升级。<sup>③</sup>美印关系在疫情大流行之际趋于靠近，美国支持印度在经济层面、安全防务和疫情上遏制中国，莫迪政府进行对华重大战略调整。继边境冲突之后，印度以威胁印度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为由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从军事、经济和外交层面向中国施压，因边界冲突和新冠疫情升级的中印紧张局势趋于恶化。疫情正加剧中印之间的政治和战略分歧，进而影响整个亚洲地区局势，距离邓小平提出的“中印共同发展”的“亚洲世纪”越来越远。

## 二、“亚洲世纪”的未来

“亚洲世纪”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近年来亚洲各国实力不断提高，而西方经济和政治实力相比之下却呈现下降趋势，人们对亚洲将主导未来世界秩序的猜测越来越多，对“亚洲世纪”的愿景辩论也尤其热烈。“亚洲世纪”的概念在一些报道中得到加强，如：《亚洲2050年：实现“亚洲世纪”》（*Asia 2050: 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以及《“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White Paper 2012*）等。如何理解和界定“亚洲世纪”的意涵，直面亚洲存在的现实困境，成为展望“亚洲世纪”的未来的关键。笔者力图在对“亚洲世纪”的既有研究的回顾中，梳理有关“亚洲世纪”的未来的各种视角和各方观点。

### （一）中国学者的观点

中国认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如何准确理解这个时代，理解“亚洲世纪”和定位自己的角色，并采取新的战略策略，是中国的核心问题。<sup>④</sup>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全局性的区域视角，更需要全球性的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

<sup>①</sup> 《崔天凯大使出席2020年阿斯彭安全论坛实录》，<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zxxx/t1805096.htm>, 2020-08-10。

<sup>②</sup> 蓝建学：《从特朗普访印看两国关系新动向》，《时事报告》，2020年第3期，[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20-03/18/content\\_41095456.html](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20-03/18/content_41095456.html)。

<sup>③</sup> 关培凤：《加勒万河谷：中国从来不是挑衅者》，《环球时报（国际论坛）》，2020年6月30日，第15版。

<sup>④</sup> Qiu Yonghui, “Asian Century: Chinese Perspective”, in Rajiv Narayanan and Qiu Yonghui edied, *India and China: Building Strategic Trust*, New Delhi: VIJ Books, 2020, p.45.

邱永辉教授在采访了数十位中国学者后总结到，中国学者认为，“亚洲世纪”是发展和复兴，而非“主宰”或“领导”世界；“亚洲世纪”是和平发展，而非战争（热战或冷战）冲突；“亚洲世纪”是团结合作，而非结盟排外。<sup>①</sup>既指出“亚洲世纪”不同于欧洲世纪和美国世纪的殖民主义和侵略霸权，同时也表明思考亚洲问题理应超越狭隘的区域视角。林冲平认为，“国际间经济相互依存促进合作而抑制冲突，鉴于中国、日本、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扩大贸易和投资的长期趋势，亚洲联盟可能会及时出现”。<sup>②</sup>但“亚洲分歧”长期存在，而且随着世界格局不确定性的增强，“亚洲世纪”的构想也增加许多不可测因素。因此，对“亚洲世纪”的到来持否定立场的观点认为，亚洲一体化进程处于不确定状态，即使亚洲经济规模大但仍不能主导未来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而且亚洲大国能否采取最优的合作策略实现真正合作是关键。疫情以来，“亚洲世纪”面临更加尖锐的选择和挑战。中国学者认为，“疫情可能加剧产业链分散化、碎片化，但有助于开拓区内市场和整合区内发展资源，打造区域发展共同体，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可望引致真正的‘亚洲世纪’到来”。<sup>③</sup>

亚洲的分歧在于国家间缺乏一致性的区域共识，中国崛起将有助于“亚洲复兴”。只要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树立起“亚洲命运共同体”意识，确立国家间的“共同责任”和“共同规范”，推动各方良性互动，亚洲复兴就能实现。<sup>④</sup>中国崛起给亚洲其他经济体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有利于推进亚洲国家的区域融合，实现亚洲整体性崛起。高祖贵认为，“亚洲整体性崛起带来的可能效应，将使因地区内部联动和整合增强导致的主要国家政策调整和关系重组加快，推动世界权力中心和战略互动持续向亚洲聚合”。<sup>⑤</sup>据此可以认为，世界经济重心、权力重心以及战略互动向亚洲偏移意味着亚洲将成为全球规则和国际规范的主要制定者，同时也表明“亚洲世纪”的到来。

中印两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也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世界已经不能想象一个没有中国和印度的“亚洲世纪”。即使中印关系存在不确定的可能性，但中印友好合作仍是“亚洲世纪”的主旋律。国内学者指出，“中印之间虽然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但合作友好的主线没有变，只有中印两国携手承担更多国际

---

<sup>①</sup> Qiu Yonghui, "Asian Century: Chinese Perspective", in Rajiv Narayanan and Qiu Yonghui edied, *India and China: Building Strategic Trust*, New Delhi: VIJ Books, 2020, pp.48-49.

<sup>②</sup> Chongpin Lin, "Two factors argue for an Asian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Vol. 27, No. 3, 2013, p.18.

<sup>③</sup> 廖峥嵘：《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亚洲世纪”》，《环球时报（国际论坛）》，2020年6月17日，第14版。

<sup>④</sup>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中国与亚洲：共同复兴之路》，《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9期，第1页。

<sup>⑤</sup> 高祖贵：《亚洲整体性崛起及其效应》，《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4期，第9页。

义务，“亚洲世纪”才会真正到来”。<sup>①</sup>因此，中印崛起是推动“亚洲世纪”成为现实的主要力量，中印两国应从世界形势中理解“亚洲世纪”，并在此愿景下，积极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 （二）印度学者的观点

中印两国共同发展并决定“亚洲世纪”的实现进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印之间的共识。随着世界局势发生重大改变，从中印团结、合作的视角理解和构筑“亚洲世纪”更加成为必然。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特别顾问迪拉杰·纳亚尔指出，“新时期以来，西方自我边缘化和孤立使旧的经济秩序正逐渐瓦解，在‘去全球化’背景下，中印需摒弃对抗和防御思维，积极探索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携手领导实现‘亚洲世纪’”。<sup>②</sup>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是“亚洲世纪”的现实基础，且随着亚洲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亚洲经济份额占世界比重越来越大，其中关键在于中印两国能否推动亚洲经济整体发展。印度前驻巴基斯坦大使拉贾万认为，“作为亚洲两个经济强国，印度和中国不仅是亚洲经济崛起的关键驱动力，预示着‘亚洲世纪’的到来，而且也将重新定义全球经济秩序的核心”。<sup>③</sup>此观点表明，亚洲未来能否决定世界格局重组和重新定义世界秩序，以及能否成为世界的经济重心，将取决于中印合作和共同崛起。

在可预见的未来，亚洲基于市场优势和人口优势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印度驻中国副大使韦玛尔认为，“21世纪毫无疑问属于印度和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国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世界正在把这两个大国视为潜在的市场和机会之地”。<sup>④</sup>而针对目前中印因边界争端、疫情造成的双边紧张局势。印度政策研究协会主任乌戴·帕斯卡尔指出，“中国和印度的双边关系已经进入‘后加勒万时代’，中印两国共同决定了具有更大全球影响力的新兴亚洲战略格局的性质与基调，中印合作关系决定着‘亚洲世纪’的未来”。<sup>⑤</sup>

印度是“亚洲世纪”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及其“东望政策”加强了亚洲统一的概念和共同繁荣的思想。虽然认同“亚洲世纪”关键在于中印两国的学者不在少数，但鉴于中印在新时期所爆发的矛盾和冲突渐趋激

<sup>①</sup> 《戴永红：中印只有携起手来承担更多国际义务“亚洲世纪”才会真正到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2006191031665805/?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sup>②</sup> 迪拉杰·纳亚尔：《中印两国应联手实现“亚洲世纪”》，中国国家发展知识中心，<https://mp.weixin.qq.com/s/20-a4Qjh6fz-pMq0jngAbg>。

<sup>③</sup> Saga Aiyar, “India, China should cooperate closely for realisation of Asian Century”, *Think-Tanks Forum*, 2019,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politics-and-nation/india-china-should-cooperate-closely-for-realisation-of-asian-century-think-tanks-forum/articleshow/72306515.cms>。

<sup>④</sup> Ibid.

<sup>⑤</sup> C Uday Bhaskar, “The ‘Asian Century’ depends on China and India working together”, <https://www.thenational.ae/opinion/comment/the-asian-century-depends-on-china-and-india-working-together-1.1064216>。

烈，实力对比差异造成中印的紧张局势，也有观点认同“亚洲世纪”并不属于印度而属于中国。对“亚洲世纪”中亚洲的界定一直为学界所争议。印裔英国上议院议员梅格纳德·德赛说到，“曾经有人说21世纪将属于亚洲，但没人知道属于哪个亚洲，现在很明显，将由东亚尤其是中国来代表亚洲”。<sup>①</sup>同时《印度快报》国际事务特约评论员拉贾·莫汉（C. Raja Mohan）也认为，“北京现在的重点是建设中国世纪，而不幸的是，中国的惊人崛起可能为‘亚洲世纪’的消亡创造条件。中印之间不断加深的冲突，必将使“亚洲世纪”以及“中国世纪”的前景变得复杂”。<sup>②</sup>

### （三）亚洲其他国家学者政要的观点

2012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指出世界发展即将迎来亚洲的世纪。亚洲经济不断增长，不仅给亚洲地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而且有助于推进亚洲大融合，他们相信“亚洲崛起正在以发展的趋势重塑世界”<sup>③</sup>。“亚洲世纪”的到来将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面对深刻的全球挑战，澳大利亚的未来将依托于亚洲地区的综合发展。因此，澳大利亚积极融入“亚洲世纪”的未来，并寻求亚洲区域的可持续性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认为，“全球权力东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亚洲人正在显示出创造一个更为稳定的世界秩序的能力，亚洲将成为未来世界的引领者”。<sup>④</sup>因此，亚洲发展将进入“去西方化”和“亚洲化”的时代，正呈现出一幅十分可观的“亚洲世纪”的图景。

但一些学者基于“亚洲世纪”的起源，从其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来表明对亚洲发展现状的担忧。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亚洲的概念在制度和文化上的整体感较为分散，没有形成制度的共同体，而且亚洲地区的经济自主性较弱，对于推进亚洲区域一体化没有稳固的现实基础，亚洲整体崛起不可能实现”。<sup>⑤</sup>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提出‘亚洲世纪’的概念没有道理，支持所谓的‘亚洲世纪’是对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未来几十年持续增长的经济

---

<sup>①</sup> Meghnad Desai, “Whose Asian century? Clearly, China’s”, <https://www.indiadailymail.com/opinion/whose-asian-century-clearly-chinas/>.

<sup>②</sup> C. Raja Mohan, “China’s hegemonic ambitions mean that Beijing’s focus is now on building Chinese century”,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china-nationalism-xi-jinping-beijing-foreign-policy-india-china-lacrow-c-raja-mohan-6493168/>.

<sup>③</sup>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White paper 2012*, Canberra: The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2012, p.136.

<sup>④</sup> （新加坡）马凯硕著，刘春波、丁兆国译：《新亚洲半球：势不可挡的权力东移》，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

<sup>⑤</sup> 王尔德：《郑永年：不存在整体的亚洲崛起》，《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3月21日，第16版。

不加批判的直线推断”。<sup>①</sup>此观点指出，过度相信亚洲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可能导致对“亚洲世纪”的误判，缺乏理性评估的“亚洲世纪”理应被质疑。

从亚洲地区当前的现实场景出发，约翰·韦斯特认为，“亚洲世纪的前景将取决于亚洲政治领导人是否有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应对亚洲世纪的‘七个挑战’<sup>②</sup>，亚洲面临中国和印度、日本极大可能的冲突，而且美国也正卷入亚洲国家的冲突中，任何一个冲突都将极大程度地破坏亚洲世纪的前景”。<sup>③</sup>因此，有观点认为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将会重塑新的国际秩序，中美对抗或将破坏“亚洲世纪”的前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指出，“疫情激化中美两国的竞争态势，导致政治互信缺失。亚洲各国能否成功控制疫情、改善民生、创建更加安全繁荣的亚洲，以及‘亚洲世纪’能否实现，都将极大取决于中美两国能否克服分歧和建立互信”。<sup>④</sup>疫情背景下，即使地区大国关系有所改善，但推进“亚洲世纪”也很可能只是停留在经济领域而难以上升至政治、安全层面。正如韩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李钟华所言，“尽管亚洲已经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力量，且新冠危机将会是加速亚洲崛起的一个转折点，但21世纪要成为真正的亚洲世纪，取决于亚洲形成统一的集体领导力”。<sup>⑤</sup>

#### （四）美国学者政要的观点

随着世界权力和经济重心渐趋倾向亚洲，“亚洲复兴”和“亚洲崛起”已成新世纪的重要战略议题，美国战略界对“亚洲世纪”的看法呈现出两种趋势。支持论者认为，亚洲将依靠不断增长的经济优势和力量优势在经济政治上重塑新的世界秩序。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认为，“亚洲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和地区合作表明亚洲崛起势不可挡，欧美即西方世界将随之没落”。<sup>⑥</sup>经济发展使亚洲全球竞争力不断提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认为，“亚洲国家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相互融合，亚洲经济一体化正在成为现实”。<sup>⑦</sup>但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鉴于

<sup>①</sup> John Lee, “The notion of an ‘Asian Century’ does not make sense”,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Vol.27, No.3, 2013, pp.26-27.

<sup>②</sup> It is “getting better value out of global value chains, making the most of urbanization’s potential, giving all Asians a chance, solving Asia’s demographic dilemmas, fixing Asia’s flawed politics, combating Asia’s economic crime and living together in peace and harmony”, in Jhon West, *Asian Century...on a Knife-edge:A 360 Degree Analysis of Asia’s Re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gapore: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324.

<sup>③</sup> Jhon West, *Asian Century...on a Knife-edge:A 360 Degree Analysis of Asia’s Re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gapore: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327.

<sup>④</sup> （新加坡）李显龙著，冠群译：《濒临险境的亚洲世纪（下）》，观察者网，2020年6月10日，[https://www.guancha.cn/lixianlong/2020\\_06\\_10\\_553543.shtml](https://www.guancha.cn/lixianlong/2020_06_10_553543.shtml)。

<sup>⑤</sup> （韩）李钟华：《21世纪真的会成为亚洲世纪？》，[https://mp.weixin.qq.com/s/bdY5vshL15O91jpiru\\_n\\_g](https://mp.weixin.qq.com/s/bdY5vshL15O91jpiru_n_g)。

<sup>⑥</sup> Paul Kennedy, “Asia’s Rise: Rise and Fall”, *The World Today*, Vol.66, No.8/9, 2010, pp.6-9.

<sup>⑦</sup> Shangjin Wei,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becoming a realit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Vol.27, No.3, 2013, p.15.

亚洲经济奇迹结束可能使其全球竞争力开始衰退，许多国外学者认为，亚洲能否克服经济活力障碍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已成“亚洲世纪”面临的巨大挑战。摩根大通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詹姆斯·格拉斯曼认为，“亚洲的世纪是现实，亚洲的奇迹并不在于经济快速增长而是因为它会逐渐放缓，以及亚洲的贫困问题等得到解决，亚洲未来的发展具有无限的可能性”。<sup>①</sup>此外，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帕拉格·康纳从全球性视角对亚洲进行多维度分析，其主要观点认为亚洲地区具有无比巨大的潜力，亚洲未来的发展将呈现出更多的韧性和延展性，“亚洲世纪”的到来表明亚洲正走向世界，并推动全球文明大融合。<sup>②</sup>在支持“亚洲世纪”的美国学者看来，亚洲复兴已经成为全球趋势和共识，美国应该积极适应和接纳“亚洲世纪”的到来。

但事实上，一些否定论者质疑到底有没有或将会有“亚洲世纪”。哈佛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认为，“‘亚洲世纪’不是‘后美国世纪’，应该更强调亚洲复苏而不是亚洲崛起，并指出事实上不存在被称为亚洲的政治实体，尽管当前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但未来几十年美国仍将可能是最强的国家”。<sup>③</sup>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认为，“‘亚洲世纪’的预测从根本上误解了它的含义，欧洲世纪和美国世纪的霸权时代已经随核武器出现和全球政治觉醒而结束；而‘亚洲世纪’的到来表明亚洲与非亚洲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对，由此造成更有可能的现实将是‘没有人的世纪’，充满争议和国际不稳定的世纪”。<sup>④</sup>这一观点从根源上将对抗和霸权主义与“亚洲世纪”相联系，进而否定“亚洲世纪”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世纪很可能是‘全球性’世纪，是领导层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国家的世纪，21世纪可能是‘亚太世纪’而不是‘亚洲世纪’”。<sup>⑤</sup>从这个意义上讲，亚太地区将是全球体系的核心和经济力量集中的区域，亚洲必须依靠美国参与才能建立系统性的规范和规则。由于亚洲多样性和发展逻辑的差异长期存在，“亚洲世纪”的基础并不牢固。迈克尔·奥斯林指出，“在其活跃的表面下，亚洲面临着经济停滞、政治动荡、战争和其他危险的风险，源于亚洲的经济或安全危机将在全球产生反响，国内政治动荡可能引发区域冲突和经济

---

① James E. Glassman, "The Asian 'century' is realit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Vol.27, No.3, 2013, p.10.

② (美)帕拉格·康纳著，丁喜慧、高嘉旋译：《亚洲世纪：世界即将亚洲化》，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③ Joseph S.Nye, "This is not a 'post-American'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Vol.27, No.3, 2013, p.12.

④ Zbigniew Brzezinski, "This will be Nobody's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Vol.27, No.3, 2013, p.9.

⑤ Charles E. Morrison, "The 21st century may well be an 'Asia-Pacific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Vol.27, No.3, 2013, pp.29-30.

崩溃”。<sup>①</sup>

总之，美国较多的学者和前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承认“亚洲世纪”的可能性，也不愿接受其统治时代即将结束、“亚洲世纪”即将或已经来临的事实，并试图从战略上割裂亚洲，更不会考虑将如何适应“亚洲世纪”。

### 三、困境分析与未来展望

“亚洲世纪”是继“欧洲世纪”和“美国世纪”之后提出的对21世纪亚洲发展的预设。“亚洲世纪”的到来，表明亚洲的实力和影响力增长，将使东西方力量趋于平衡，甚至可能重塑世界政治格局。事实上，亚洲目前正处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具有为其公民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巨大潜力，但成功的要求和失败的风险同样巨大。我们需要通过对亚洲发展的困境进行总结和分析，展望“亚洲世纪”的未来。

#### （一）亚洲世纪的困境分析

亚洲国家的发展和“亚洲世纪”的建设，在不同的时期面临不同的困境。这些困境的延续或“后遗症”，长期影响着亚洲发展的进程和“亚洲世纪”的实现。

冷战时期亚洲的困境来自于域外因素和国际格局重组，即亚洲在处理“殖民主义的遗产”过程中引发的双边冲突与对抗，美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地缘政治争夺和地缘战略竞争，地区意识形态分立对抗引起的区域紧张局势、矛盾，甚至军事对抗和战争。这两层因素在当时严重破坏了亚洲区域秩序和格局稳定，对亚洲国家在今天争取“亚洲团结”留下心理阴影，并为美国20世纪80-90年代在经济上打压日韩制造了借口，也为其今天全方位打压中国塑造了一个冷战思维。

后冷战时期，经济危机的爆发使亚洲经济发展遭受重创，许多国家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乃至衰退期，甚至还影响着亚洲国家目前的发展。东南亚地区至今难以走出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产业体系固化等困境，由此造成亚洲地区多元化格局难以形成。对日本来说，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不仅造成国内经济衰退，而且使其政治影响力下降，削弱其当前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的领导力量。未完成的政治革命造成今天亚洲政治发展的内生缺陷，即缺失稳固的政治基础，导致亚洲国家在推进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发展和国家认同建构问题上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危机和政治革命不彻底的后续影响在短期内无法彻底消除，这两重困境使人们对“亚洲世纪”前景的长期假设不再乐观。

后经济危机时代，如何应对政治危机和经济活力的障碍成为亚洲发展的主要问题。从目前形势观察，政治腐败已成亚洲政治发展的重要问题，但亚洲国家的应

---

<sup>①</sup> Michael R. Auslin, *The End of the Asian Century: War, Stagnation, and the Risks to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

对能力不足和腐败治理的长效机制缺失，必然造成亚洲政治发展中的腐败问题长期存在；历史遗留和新矛盾争端并存加剧亚洲政治分歧，并在域外政治势力的干预下渐趋恶化，以多元文明为基础构建的区域政治共同体无法实现。从经济层面来看，因经济危机“后遗症”导致的经济活力障碍已经成为当前亚洲经济发展的现实，人口红利消失、经济改革失败、国家间竞争是阻碍亚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些危机、分歧和经济障碍目前仍存在于亚洲地区，并将长期影响“亚洲世纪”未来的发展。

新形势下，亚洲发展更多受到世界格局变动和国际因素的影响。一是中美公开对抗造成的国际体系动荡，加大对亚洲秩序和亚洲发展的挑战。而且，由于域外政治势力的干预，亚洲国家的区域国际环境趋于恶化。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对抗仍将是“亚洲世纪”的主要危害。二是中印关系变动，将触动整个亚洲地区的和谐与平衡。中国和印度两国可能存在的激烈竞争，严重危害“亚洲世纪”共识的形成，导致无法形成亚洲发展的合力，中印竞争加剧在未来将成为“亚洲世纪”的重要危害。三是不可测因素增加对“亚洲世纪”的挑战。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政治格局和政治秩序重组，可能导致“亚洲世纪”的进程发生重大改变，“亚洲世纪”的未来将面临更加残酷的选择。

从目前局势观察，“亚洲世纪”的旧风险与新挑战并存。当前“亚洲世纪”面临的困境主要来自国际因素变化引起的地区分歧和区域对抗，以及地区精英们盲目的政治自信。亚洲地区经济与政治、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可能引致更加复杂多变的地区紧张局势，甚至触发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危机的可能性，使“亚洲世纪”陷入不可预测的危机。

## （二）亚洲世纪的未来展望

新冠疫情造成世界格局重组和力量配比改变，引发全球性政治危机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给“亚洲世纪”的实现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一是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不确定。中美关系因疫情持续恶化，由经贸冲突上升至全面的战略对抗。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因中美结构性矛盾不会改变，中美中长期的战略对峙仍将持续存在。一方面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不会削弱，双边分歧难以得到实质调解，周边地区问题仍是美国刺激中国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推行“认同政治”，不断巩固和推行同盟战略，煽动西方世界的反华情绪，“认同政治”危机给中国外交制造巨大阻碍。

二是中印关系不确定。当前中印关系因疫情和边界对峙不断升级，印度对华实行遏制战略调整，中印边境冲突的安全溢出效应已经从经贸领域进入教育文化领域。中印之间历史与现实的冲突、文化与意识的反差、“两强对峙”的结构性困境、以及大战略的同类别与异目标使中印边界问题将长期存在，甚至可能引致激烈



的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两国战略竞争。实现地区霸权的战略设想使印度有选择地追随美国实现其短期的战略目标，中印关系未来走向取决于印度的战略选择。

三是地区局势不确定。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变动、非传统安全威胁、历史遗留问题等造成区域多边局势互动多样，地区互动的多变性和交易性明显增加，亚洲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造成地区局势的不确定，导致亚洲成为潜在武装冲突的热点地区。大国间的对抗将颠覆现存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美、中印关系长期竞争将限制亚洲的经济、政治共识，使亚洲其他国家选择“中间道路”，其结果是东盟及亚洲可能出现区域霸权。

综上所述，亚洲发展的不确定性严重阻碍“亚洲世纪”的进程。因此，当前流行的两种观点，一是“亚洲世纪”没有现实意义，二是“亚洲世纪”并无实现的可能，均为否定性评判。笔者认为，亚洲大国崛起是与亚洲复兴的进程相适应的，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都是“亚洲世纪”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将“亚洲世纪”等同于“中国世纪”，是从本质上错估了印度、韩国、东南亚等亚洲国家在亚洲地区的重要贡献和作用，误解了“亚洲世纪”的本质内涵。亚洲各国如何重新定义“亚洲世纪”，建立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以及合作和信任的文化，并协商解决区域内的矛盾争端，是亚洲未来“向何处去”的关键问题。2020年的新冠疫情危机下，世界格局出现分裂、分化和重组等一系列变化，中日韩和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合作凸显出疫情治理的区域合作优势，展现了区域性的医疗防护共同体雏型，亚洲也因此成为全球治理趋势的引领区域。因此，在团结、分享、共赢、多边主义的语境下，以“亚洲世纪”的理念整合亚洲发展，不仅是一种选择，而且是十分必要的选择。

“亚洲世纪”不仅是“亚洲团结”和“亚洲复兴”的理念，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区域内的实践。但是，亚洲各国不同的政治制度，区域性的经济结构矛盾，对中国崛起的理解，以及美国的“认同政治”陷阱，都将使亚洲国家间的政治分歧扩大，大大弱化“亚洲世纪”的动力。从理性的视角看，亚洲目前的发展缺乏整体性和目标一致性，地区共识淡薄，单一经济实力提升并不能引领全方位的“亚洲复兴”，也不能支撑真正意义上的“亚洲世纪”到来。这也要求亚洲各国在大国博弈中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在良性竞争中促进国家间合作，正如“美国世纪”中存在竞争与冲突，与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合作一样，“亚洲世纪”也强调竞争、冲突与协调的关系组合，未来的“亚洲世纪”更可能是在变动世界中合作的世纪，其轮廓将呈现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发展形态。

[责任编辑：孙喜勤]